

## 蘇聯境內猶太人問題的探討

劉心華

蘇聯自戈巴契夫上臺後，對西方開始採取彈性態度。去（一九八五）年年底美蘇日內瓦高峰會議之前，戈首積極展開和平宣傳攻勢，移駕訪問法國。但是當雙方一提起人權問題或猶太人問題時，蘇聯方面又表現出強硬的立場。甚至日內瓦高峰會談在這方面的磋商也令氣氛顯得尖銳。難道蘇聯內部的猶太人問題是先天性的不治之症？本文將追溯其歷史的原由，然後進一步研究自一九一七年蘇聯共產政權建立以後，其意識形態與猶太人問題又發生了什麼樣的關連，及其對猶太人問題又訂下了什麼樣的政策。

其次，蘇聯政權對猶太人的錫安主義（Zionism）是恨之入骨而絕不妥協的；而一九四八年以色列的建國，却是錫安主義具體的實現。故自中東問題發生以來，蘇聯就一直站在支持阿拉伯世界反抗以色列的立場。但是這一個一直被認為理所當然的政策和態度，也隨著美蘇和解，東西方緊張情勢的緩和而開始有了轉機。從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蘇聯已表示欲與以色列恢復邦交的意向，難道戈氏會把多年來的衝突拋開不顧，或是另有所圖？本文也將一併加以研討。

### 一、歷史原由

#### (一) 中世紀前是俄國內部猶太人的蜜月期

中世紀以前，俄國境內的猶太人比歐洲境內的猶太人享有較多的自由和較高的社會地位。早在基督時代以前，猶太人就已遷

居俄國境內，也漸漸形成俄國社會中重要的一羣。開始時，他們擇居於高加索地區；西元二世紀左右又出現在喬治亞地區；到了八世紀，一部份聚居於克里米亞與立陶宛一帶；十三世紀韃靼入侵時，頓河、德涅伯河和窩瓦河兩岸都有他們的足跡。基輔公國時期，弗拉基米爾雖然已明定東正教為俄國國教，但是仍然容忍猶太民族和猶太教的存在與發展。在十六世紀前，在社會地位上，俄國境內的猶太人比歐洲境內的猶太人優越。在此時期，他們既享有宗教自由，也從沒有受到身體上或心理上的迫害。更重要的是，不論是官方或民間，都還未形成歧視猶太人的氣氛。甚至許多歐洲境內的猶太人為了逃避當地的迫害而遷往俄國。從這一事實看來，可見俄國並不是一個天生就歧視猶太人的國家，猶太人在俄國境內也享有一段很長的蜜月期。

## (二) 帝俄沙皇時期種下了猶太問題的根苗

西元十六世紀以後，猶太人問題却成為俄國沙皇政權最嚴重的問題之一。不僅是官方，在民間也同樣形成了一股排斥猶太人的勢力。其主要原因，是猶太族的宗教、文化、生活方式與傳統的東正教格格不入且互不相容；寄人籬下的猶太族，其個性又堅毅固執，因而種下了代代相傳的仇隙。

猶太教堅決否定耶穌基督的地位和價值，並認定猶太人是上帝的「唯一選民」，而排斥其他任何宗教的並存，且主張以嚴厲的手段對待其所謂的異教。這些思想和準則更明確地列入了猶太法典，做為他們生活的準繩。

十五世紀末期，俄國境內興起了「信奉猶太教」的風尚，莫斯科公國內一度充滿了信奉猶太教的教徒與同情猶太教的人士，其中包括一些傳教士與政府高官，嚴重威脅到俄國的東正教文化，因而造成了基督教對猶太教嚴厲的反動，同時對猶太人的勢力普遍地產生了恐懼感<sup>①</sup>，導致了十六世紀以後，綿延不斷的排猶主義。

另外，猶太人堅守以猶太教為主的傳統文化，經常令俄國人無法容忍。俄國人普遍認為，猶太人的生活根本不屬於俄國的生活方式；加上猶太人天生善於經商和理財，也使得俄國人認定猶太人的思想和商業主義或經濟侵略主義的哲學密不可分，而這種思想更難容於傳統的俄國社會。甚至許多一生主張自由、開明的俄國作家，儘管在基本上反對官方對猶太人的歧視政策，但是私下也不反對「排猶主義」的觀點。例如，十九世紀俄國大文豪杜思脫也夫斯基曾公開提到，猶太人在東正教的社會裏是一個有害的外來勢力<sup>②</sup>。至於官方，由於牽涉到政治的管理問題，更使得衝突尖銳化。一八八四年，一個專門處理猶太事務的官方機

註① Thomas E. Sawyer, <The legal Statute of Jews In the Soviet Union, > *The Jewish Minority in the Soviet Un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79), p. 104.

註② Leonard Schapiro, <Introduction, > in Lionel Kochan (ed.), *The Jews in Soviet Russia Since 191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

構會上書沙皇政府，明白指出猶太人與官方不合作的情形。報告中指出，猶太人的生活方式完全依據猶太法典，始終認為生活在俄國土地上是一個過渡的階段。他們所等待的是彌賽亞的來臨。因此一直到十九世紀末，仍然只有百分之三的猶太人以俄語作為母語，而百分之九十七的猶太人仍使用意第緒語（Yiddish）。根據一八九七年的資料顯示，只有百分之二十四點六的猶太人能讀寫俄文<sup>③</sup>。按上述情形看來，儘管猶太人是少數民族，而且寄居於別人的土地上，却仍固守著自己傳統的宗教、文化和民族意識，而不惜與其他民族隔離。這些現象都是造成了俄國人對猶太人反感的原因。

沙皇對猶太人的政策，在初期所採取的方式是：如果不能使猶太人同化於以東正教文化為主的俄國社會，就施以嚴厲的高壓手段。沙皇伊凡四世（一五三三—一五八四）曾說：「洗禮那些肯接受基督教信仰者，而淹沒其他的」<sup>④</sup>。這句話正顯示了當時俄國的猶太政策。但是由於猶太民族對自己的宗教與文化相當執著，所以沙皇政府更不能容忍這個信奉「異教」的猶太民族，也從此開始了對猶太人嚴厲的壓迫政策。例如：嚴格限制其居住區、謀職機會與從事職業，強迫其服少年役，以及採取「放逐」等種種懲罰方式。

十八世紀下半期，俄國三次參與瓜分波蘭，俄國版圖加入了一部份波蘭——立陶宛的土地，因而猶太人數目突然增加了九十萬人。於是沙皇政府必須另外訂定法則來管理這些猶太人。凱瑟琳二世時，頒佈法令，將併吞地區內的猶太人與非猶太人劃清界線與權利。非猶太人可自由進出俄國，並准許享有與俄國人同等的待遇。但是猶太人則不准離開被併吞的土地範圍，所享有的權利也大受限制。這些地區就是後來所謂的「殖民定居區」（Pale of Settlement）。

在尼古拉二世被推翻之前，雖然也曾出現幾度好景，如亞歷山大一世和二世期間，曾經設法疏解猶太人問題，給予較好的待遇，但因先後都受到政治保守主義的衝擊而終告失敗。尤其在亞歷山大二世統治後期的波蘭暴動及被刺殺事件，一般都認為是受到猶太革命份子勢力的影響。隨著這些事件的發生，亞歷山大三世對猶太人更感厭惡。於是一直到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為止，沙皇政府對猶太人採取迫害政策以作為報復。例如亞歷山大三世在烏克蘭地區展開有計劃的屠殺猶太人行動，並頒佈法令，使得猶太人在居住範圍、教育機會、經濟活動、就業機會等方面都受到合法性的歧視。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尼古拉二世在位期間，由於革命事件頻頻發生，沙皇認為革命運動是猶太人的陰謀。同時，俄國大肆提倡狹隘的民族主義。隨著日俄戰爭的失敗，整個沙皇政權發生動搖。為了掩飾錯誤，因而展開了激烈的排猶宣傳。一九〇五年十月在數百個猶太居住區內進行有計劃的集體屠

註<sup>③</sup> S. Erlinger, <The Jews in Russia At the Outbreak of the Revolution, > in Lionel Kochan (ed.), *The Jews in Soviet Russia*

Since 191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5.

註<sup>④</sup> Thomas E. Sawyer, p. 102.

殺，由當地警察在軍隊的掩護下大肆進行。另外在反猶太右黨的支持下，組成了俄國人民聯盟和黑色百人團，攻擊猶太人和反沙皇政權的革命份子<sup>⑤</sup>。

二十世紀初，猶太人問題已由宗教、文化的衝突轉變成政治問題。當時的保守主義份子和革命份子藉著猶太人問題展開了激烈的政治性爭論。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個問題和爭論變得更为尖銳；相對地，猶太人的遭遇也變得更为悲慘。俄軍在東線戰役的失敗，沙皇政府歸因於猶太人暗中幫助敵人，隨後再度展開迫害猶太人的行動。此時猶太人的情況可以說已悲慘到難以生存的地步，因此唯一能解救他們的方式就是迫使沙皇政權倒臺。由於現實的政治因素，猶太人積極參與了推翻沙皇政權的革命，也從此使得爾後的蘇維埃政權在處理猶太問題上更為棘手。

## 二、猶太人與俄國的十月革命

### (一) 沙皇政權末期，猶太人的革命黨派

由於受到歷代沙皇政權的壓迫，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猶太人開始大力投入革命的行列以尋求解放。

革命期間，俄國境內猶太人的政治觀點可分為兩個主要的派系：一派主張爲了尋求猶太人的解放，應該拋棄素所固守的傳統，而完全同化於俄國社會，求取與俄國人大結合，也就是將猶太問題的解決寄望於整個俄國羣衆的解放；另一派較爲激進，由於多年的仇恨，對俄國抱持完全失望的態度，而主張建立一個專屬於猶太人的政治區。兩派雖然觀點不同，想要達成的理想也不同，但却有一個共同的政治行動，就是推翻壓迫他們達數世紀之久的沙皇政權。

在衆多的革命黨派中，猶太人都居於領導的地位。如民粹黨的主要領導人然德列維琪（Aaron Zundeleovich）和馬格特（H. Magat）、土地與自由黨的主要領導人尤金（Nicholas Utin）、著名的革命份子保羅·亞克斯羅德（Paul Axelord）和列夫·謀琪（Lev Deich）等都是猶太人<sup>⑥</sup>。這些猶太人的主張都是屬於前一派，同時也都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力求建立一個包容俄國全體人民的政治實體，以求取解決。他們宣稱：「對我們而言，猶太人只是一個民族有機體，並不值得去支持。猶太民族意識毫無存在的價值。至於宗教，像水泥一般地把猶太人凝聚在一起，它代表的是落伍」<sup>⑦</sup>。這一派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組織

註<sup>⑤</sup> S. Ettinger, p. 18.

註<sup>⑥</sup> Thomas E. Sawyer, p. 109.

註<sup>⑦</sup> *Ibid.*

是「立陶宛、波蘭、俄羅斯猶太工人總聯盟」，簡稱為「邦得」(Bund)。「邦得」是一個馬克思主義黨派，成立於一八九七年，為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重要部分，其目的在確保俄國猶太民族的地位和現代化。一九〇三年俄國社會民主黨在倫敦召開大會時，「邦得」黨員為了猶太民族問題退出了社會民主黨，致使列寧和其黨羽贏得多數的席位，進一步控制了整個社會民主黨。這個事件也加速了後來社會民主黨的分裂，進而產生了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兩個黨派。

堅持後一派主張的猶太人政黨，就是錫安主義黨。這個政黨純然以猶太民族主義為依歸，一直到今天，還影響著蘇聯的猶太政策。錫安主義黨成立於一九〇五年，主要目的是力圖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猶太人的王國。屬於該黨的猶太羣眾都以希伯萊語和意第緒語為主要語言。一九一七年時，參加這一黨派的猶太人數達到巔峯，約有三十萬人。另外還有一派，稱之為錫安主義工黨，成立於一九〇六年，也試圖建立猶太人自己的王國，但不一定要在巴勒斯坦地區<sup>⑥</sup>。

## (二) 猶太人與布爾什維克黨

雖然孟什維克黨和布爾什維克黨都是屬於馬克思主義黨派，但是孟什維克黨的主張較為西化，較為國際化，並且偏向於世界主義的社會主義運動。對於猶太革命份子來說，這個運動的目的在給予全體民衆一個較好的生活，而非僅針對一個民族。反之，布爾什維克黨比較具有俄國民族主義的色彩，它對文化、經濟、政治的主張與猶太人利益較有衝突。例如，布黨禁止自由貿易，這對於大部份從事零售商和工藝的猶太人是一個很大的威脅。加上列寧本身對錫安主義和猶太傳統有強烈的否定看法。因此，大部份猶太人對布黨採取冷淡的態度。而參加布黨的猶太人，大部份都是同化份子，反對猶太主義。一九一七年之前，祇有九百五十八個猶太人加入布黨，到是年元月參加布黨的猶太人增加到二萬三千六百人，主要大概是由於形勢所造成。參加布黨的猶太人數目雖然不算多，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領導階層中占有許多重要的地位。例如，一九一七年八月，在二十一名中央委員中，猶太人就占有六名。他們是：托洛茨基(Trotsky)、卡米涅夫(Kamenev)、索科尼可夫(Sokolnikov)、史渥德洛夫(Sverdlov)、尤列茨基(Uriskii)和里諾維也夫(Zinoviev)。其中托洛茨基被視為僅次於列寧的主要人物，其職位是外交首長和軍事革命委員會頭子。因此，列寧曾說：「由於對猶太人的壓迫，導致了對沙皇的憎恨，因此在革命運動的領導者中，猶太人佔了極大的比例」<sup>⑦</sup>。隨著這種情勢，當十月革命成功，沙皇政權崩潰以後，許多政府重要位置都被猶太人佔據。例如布黨最初的秘密警察部門「契卡」(Cheka)，就有很多猶太人參加，這也許是一種心理補償作用。由於過去沙皇的種種壓制，猶太

註⑥ Ibid., p. 111.

註⑦ Lenin, *Sochineniya* (Moscow, 1927), vol. 19, pp. 354-5.

人現在渴望與俄羅斯民族平等相處。秘密警察也是一種代表實際權力的誘惑，因此，猶太人紛紛加入「契卡」。但是契卡是布黨權力中最令人痛恨與害怕的組織，因此俄國人反猶太的情緒再度隨著契卡的恐怖統治而升高，這也就是今日逃亡海外的俄國人仍然痛恨猶太人的原因之一。

### 三、猶太文化與馬克思主義

共產黨在其政治運作上最講究意識形態理論的闡釋。以下說明布爾什維克黨在俄國革命成功以後，如何以馬克思理論為基礎來解釋其意識形態與猶太文化的異同。

猶太人自紀元前五八六年亡國以來，人民流散於世界各地，早已無國家實體的存在。進一步從猶太教義來看，猶太人本來就沒有國家觀念，而只存有民族意識。猶太人堅信：猶太民族是上帝唯一的「選民」，他們的子民散居於世界各地，只是暫時停留，他們的目标是等待未來救世主彌賽亞的來臨，帶領他們到達最終的樂土。而馬列主義者則認為，國家不是永遠存在的，當社會發展到沒有階級區分的階段時，國家也就自然消滅了。所以在這一方面，猶太文化符合了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也成為他們在革命階段結合的原因之一。

從經濟的層面來看，猶太人在沙皇政權長期的經濟壓迫下，幾乎成了無以維生的純無產階級者。在馬列主義者號召無產階級革命的口號下，猶太人對馬列主義的革命當然抱著無限的希望。但是馬列主義的政權到底不是猶太文化中的樂土，不管在意識形態上或是權力鬭爭上，都存在著無法妥協的衝突。

雖然列寧公開承認猶太人在推翻沙皇政權革命中的貢獻，但是他仍意識到，猶太民族的意識和文化，在基本上仍有許多層面與馬列主義格格不入，相互衝突。例如在政治體制上，在國家分權的「聯邦制」和民族自決權的「自治制」問題上發生了爭論。代表猶太派系的「邦得」黨支持實施聯邦制，認為「黨的各部份之間，為了緊密團結，必須實施聯邦制。因為聯邦制的主要特性就是黨的每個組成部份，都能直接參與黨的事務；基於此，黨的各個部份才會是平等的。而自治制會形成黨的各部份的專權，造成對共同事務的漠不關心，相互間的不信任、摩擦和衝突」<sup>⑩</sup>。在一九一七年革命成功後，由於各個民族紛紛要求獨立，在客觀環境的牽制下，列寧提出了「聯邦制」的政策，但是他為了解決俄國的民族問題，曾一度主張採行民族自決的「自治制」。列寧認為「自治可以使合併成爲一個漸進的過程，可以使因改組而可能帶來的破壞減少到最低限度」<sup>⑪</sup>。他又提到：「一九八九年章

註⑩ 列寧，〈崩倒在黨內的地位〉，《列寧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頁七六—七七。

註⑪ 列寧，〈最高的厚顏無恥和最低的邏輯推論〉，《列寧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頁四八。

程所列的「自治」，保證了猶太工人運動所需要的一切東西：用猶太語進行宣傳和鼓動，出版書籍和召開代表大會，其中又提出特殊要求來發揮總的社會民主總綱領，以滿足衆猶太人生活特點所產生之地方性的需求。但在其餘各方面，都必須完全同俄羅斯無產階級最密切地結合在一起，必須維護俄國整個無產階級鬪爭的利益。……這種自治可以保障不受少數服從多數原則的約束，而在同一專制制度下，與全俄資產階級鬪爭的問題上，我們應當成爲統一的、集中的和戰鬪的組織，我們應當不分語言和民族，依靠整個無產階級，……而不應當建立各行其是的組織，不應當分散成許多獨立的政黨而削弱自己進攻的力量，不應當散播隔膜與分散，然後又用聲名狼藉的「聯邦制」的膏藥來醫治自己故意造成的疾病」<sup>12</sup>。

其次，對於民族主義和民族文化的爭論也使得兩者的衝突尖銳化。猶太人本來就嚴守其法典準則，非常重視其民族意識和文化，但在共產黨領導的政權下，這些東西却是蘇聯領導者想極力摧毀的目標。列寧同意馬克思主義理論卡爾·考茨基對猶太人的看法。考茨基認爲，猶太人作爲一個民族，應該是不能成立的。因爲一個民族沒有一定的地域是無法想像的。至於有人提出猶太人是不是一個特殊的民族？他的答案也是否定的。「因爲民族的概念要以一定的條件爲前提，而猶太人却沒有這些條件。其次，民族應當有它發展的地域，一個民族應當有它共同的語言，而猶太人既沒有地域，又沒有共同語言，要是錫安主義得逞，他要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同鄉接觸，也並不簡單」<sup>13</sup>。對於民族主義的看法，列寧認爲它是「資產階級的口號；民族文化是黑幫、教權派以及一切民族之資產者的藉口。這些資產者企圖在大俄羅斯、波蘭、猶太、烏克蘭等民族文化的幌子下，幹著反動的骯髒勾當」<sup>14</sup>，而無產階級講求的是國際文化。在共產主義的政權下，猶太人是甚難保持其民族意識和文化的。猶太人必須同化於蘇聯共產文化之下，才能生存於其中央集權的體制下。

從共產主義經濟理論來看，馬克思在早期的觀點上就鄙視猶太主義及猶太教。他認爲猶太主義是小資產階級和金錢權力的具體表徵。由於猶太人的生活以猶太主義爲中心，世代作中間商，從事買賣，馬克思主義者認爲這種方式破壞了社會的凝聚力，而以市場與金錢取代了人與人之間正常的關係，而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社會主義<sup>15</sup>。

綜觀上述各點，儘管爲了共同反對沙皇政權，使俄國猶太人與俄羅斯馬克思主義革命者結合在一起，但是在意識形態上，雙方却存在著無法調和的衝突，以致在革命後，猶太人在蘇維埃政權下，仍舊無法達成自我解放的目標。

註<sup>12</sup> 列寧，〈猶太無產階級是否需要「獨立的政黨」〉，〈列寧全集〉，第六卷，頁三〇一～三〇二。

註<sup>13</sup> 列寧，〈崩倒在黨內的地位〉，同前註書，頁八二一～八二三。

註<sup>14</sup> 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同前註書，第二十卷，頁五。

註<sup>15</sup> Jacob Miller, <Soviet Theory on the Jews, > in Lionel Kochan (ed.), *The Jews in Soviet Russia Since 191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46-47.

## 四、蘇維埃政權的猶太人政策

### (一) 猶太民族政策

蘇維埃政權成立以後，在處理猶太人問題上，由於理論與實際常有矛盾，一方面它不把猶太人看作是一個民族，但另一方面在政治管理上，有時又不能不把問題納入民族政策的範疇內來處理，因此其政策常顯得反反覆覆，矛盾百出。

理論上，列寧不認為猶太人是一個民族，他堅信解決猶太人問題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將其融合於蘇聯全體居民裏。史達林在一九一三年寫的一篇論文《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中提到，「像格魯吉亞的、達格斯坦的、俄國的、美國的和地方上的猶太人，彼此語言不同，生活在地球上不同的地方，從來不能見面，無論和平時期或戰爭時期都不會共同行動，這管什麼猶太民族呢？」又說：「如果他們中間還有什麼相同之處，那就是宗教、共同的起源和民族性格的某些殘餘」<sup>①</sup>。由此可見，蘇聯在政策的理論上，否認猶太人為一個民族，但却否認它有共同的民族性。因此在政策的制定上，處理猶太人問題仍然是強調同化。

另外，還有若干實際的困難，令蘇聯政府無法處理境內其他少數民族的方式來處理猶太人問題。

(1) 自沙皇政權崩潰後，「殖民定居區」被廢除，猶太人散佈到蘇聯境內各個地區，但在各共和國內人數都不滿一百萬人，因此根本無法像其他民族一樣以「民族自決」政策或「聯邦制」政策來執行對猶太人的政策。

(2) 猶太人在蘇聯境內未能形成一固定區域以便宜行政管理。蘇聯政府在初期爲了解決猶太人的居住與經濟問題，曾經在一九二五年試圖建立猶太自治省，地點選在烏克蘭或克里米亞，但是由於這些地區的土地競爭非常激烈，受到當地的烏克蘭人和鞑靼人極力的抵制，而終告作罷。接著又於一九二八年計劃在畢羅——畢得罕（Biro-Bidzhan）建立猶太自治省，一方面藉此打擊以色列錫安復國主義，另一方面又可加強遠東地區的防衛；但也由於自然環境的極其惡劣，移往當地的猶太人甚少，終致又告失敗。

(3) 猶太人的生活方式對於土地並無附著力。五、六百萬的俄國猶太人只有百分之三到四從事農業，其他百分之九十六從事貿易、工業，或在城鎮機構工作。他們由於生活的需要，散居在各大城市，自然無法像其他民族一樣集中管理，唯一可行的政策，也只有力求同化了。

註① 史達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斯大林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頁二九一—三〇〇。



基於上述種種因素，蘇聯境內猶太人往往在許多方面無法與其他民族享有同樣的權利，例如猶太學校的建立以及猶太宗教、語言、文化的保存等。這些也造成了猶太人，尤其是錫安主義者和「邦得」份子普遍的不滿和反抗。

但是從政治的宣傳和行政管理來看，爲了實際執行工作的方便，蘇聯當局又不得不承認猶太人具有民族的特性，必須視之爲「一個民族」來制定政策。早在一九一四年列寧在布黨就提出了一個有關民族權力平等的辦法。其中清楚地把猶太「團體」界定爲一個具體的民族，並聲言在未來共產國家內享有合法的地位。他藉此以強調俄國所有民族在法律前一律平等。一九二一年三月共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中，也重申猶太人爲其境內少數民族之一<sup>⑩</sup>。

一九三二年九月蘇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頒布了「蘇聯身分證規則」。依據該規則，自一九三三年起，國內身分證個人資料欄內必須註明個人所屬的民族。在該欄內，猶太人明白地填寫爲「猶太人」(Yevrei)。另外，在許多政府機構和文件上，都將猶太人視爲一個民族，以便處理有關事務。

一九三六年史達林所頒布憲法與一九七七年布里茲涅夫時代所頒布的憲法，都明文規定了猶太人的合法權益與其他民族相同。例如一九七七年憲法中第三十四條、三十六條、四十五條等都對猶太人的宗教、語言、文化有所保障。但是在實際執行上，蘇聯各個領導者都不斷地極力摧毀具有小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猶太主義。可見在共產主義社會裏，意識形態的影響力，常會超越憲法規定，政策的執行頗受意識形態的左右。茲舉例說明如下：

在民族語言方面，憲法中規定可用民族母語來教學，但是在蘇聯境內找不到一所猶太語的學校或班級。一九四一年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地區被納粹所破壞的猶太學校，蘇聯未再開放。甚至在畢羅——畢得罕猶太自治省的幾所猶太學校在一九四六年也遭到關閉。對於這一點，蘇聯官方曾提出兩點解釋：(1)人口分散，花費太貴。赫魯雪夫在一九五六年答覆戴維斯教授 (Jerome Davis) 道：「由於猶太人分散於蘇聯各個地區，要在蘇聯到處設立猶太學校，花費太大」<sup>⑪</sup>。但是這個理由太過牽強，以蘇聯境內的德國人爲例，他們的人口比猶太人少了許多，並分散於十二個共和國內，他們的自治共和國早在二次大戰以前就被廢除，但在一九六四年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頒布法令，准許若干省、地區、共和國設立以德語教學爲主的學校。(2)大部份的猶太人都已同化於俄國文化中。一九五六年赫魯雪夫答覆法國議會代表團道：「猶太人同化的速度驚人，即使我們設立猶太學校，也沒有多少人自動去就讀」<sup>⑫</sup>。事實上，從歷史看來，猶太人是最不易被同化的民族。

註⑩ William Korey, <The Legal Position of Soviet Jewry, > in Lionel Kochan (ed.), *The Jews in Soviet Russia Since 191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76.

註⑪ *Ibid.*, p. 84.

註⑫ *Ibid.*, p. 85.

在民族文化方面，史達林公開贊成黨支持民族文化的政策。史達林認為民族文化必須給予一個機會去發展，光大和恢復其潛能，以便建立一個融合各種文化、各種語言的文化熔爐。事實上，猶太文化機構却不斷地遭到關閉和廢除，其中包括：博物館、劇院、圖書館等等。另外以意第緒語出版的圖書、刊物、報章等也遭到查禁。

據以上所述，可知猶太人在蘇聯社會中處於尷尬的地位。他們具有境內少數民族的特性，但却無法享有少數民族所應有的權利。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蘇聯當局在同化猶太人政策與解決猶太人問題上確實作出很大的努力，特別是致力於改變猶太傳統經濟經營方式。

幾世紀以來，猶太人一向從事小買賣、中間商的經營方式。隨著革命與新政權的到來，猶太人苦心經營的事業毀於一旦。私人交易被禁止，國內外貿易、商業全由國家所獨攬，致使猶太人遭到嚴重的打擊。有一部分的知識份子遷往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大城市，而大部分留在原地的猶太人，幾乎無法謀生。政府唯一能解決的就是將他們的經濟經營方式融入社會主義建設的革命列車裏。一九二四年，烏克蘭共和國宣佈准許猶太人在克里米亞和南俄地區定居；一九三〇年又開放若干土地供猶太人耕作，開始了猶太人國內的新移民政策。

這個政策也是問題重重，除了土地和人力之外，生產資本、機器、技術等等都是問題。此時，西方的猶太組織，尤其是美國猶太農業企業團提供了大量的支援。根據蘇聯猶太人移民協會在一九三〇年代的報告，自一九二四年起約有十三萬五千名猶太人移民至克里米亞、南俄、白俄羅斯等地區。這個移民政策，配合外來的支援，成功地迫使從前為小販、零售商的猶太人在短期內成為蘇聯最好的農夫，加入了蘇聯政權所謂的社會主義建設行列。這一政策且影響了後來的五年計劃（一九二八—一九三三）與工業化，在國外猶太救援組織的幫助下，以國家財政為後盾，這個政策推行到蘇聯各地，使生產達到了頂點，也使一個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措施，變成了國家重建的主要企劃。

在工業化建設上，蘇聯主張「趕上並超過資本主義國家在工業方面的發展」，將農業化的俄國轉變為工業化的國家。不可避免的，大部份的猶太人也從土地經營轉到工廠內工作。隨著大小工廠的建立，猶太工人的數目也逐漸擴增。事實上，他們比俄羅斯農民更適於工廠操作。大部份的猶太人適應城市生活，他們具有高度的領悟力，很能駕輕就熟地操縱複雜的機器。因此到了一九三三年五年計劃結束時，猶太人從事重工業的比例比其他職業高出很多。小買賣已不再是他們的收入來源，相反地，他們變成了蘇聯工業生產的原動力。同時在經濟上，這也部份地解決了由來已久的猶太人問題<sup>②</sup>。

註② William Zukerman, <Soviet Russia Solves the Jewish Problem, > in Jay Pilsner (ed.) *Anti-Semitism & Jewish Nationalism* (Virginia: Donning Company, 1981), pp. 133-139.

## (一) 排猶主義 (Anti-Semitism)

俄國革命初期，布黨和孟黨都極力譴責沙皇政權對猶太人的歧視政策。但是社會上排斥猶太人的氣氛仍然相當普遍，屠殺猶太人事件不斷地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等地發生。蘇聯政權爲了消除國內的排猶氣氛，曾一度將排猶論者視同反革命份子處理。一九一八年七月人民委員會公佈法令：「排猶運動與反猶太的屠殺是等於對社會主義農人革命和工人革命的打擊……任何教唆或執行屠殺事件，都被視爲非法」<sup>②</sup>。基本上，蘇聯當局不管是在公開或私下的場合都拒絕承認排猶主義或歧視猶太人問題仍存在於蘇聯社會。尤其在宣傳的口號上，更是強調蘇聯憲法保障所有各民族一律平等，而他們所反對的只是錫安復國主義。但事實上，不管在官方或民間仍存在著強烈的反猶太人氣氛，歸納其因素有下列幾項：

(1) 經濟競爭：猶太人有其傳統苦幹的美德。他們天生善於商業的經營和管理，再加上大部份猶太人爲城市居民，受的教育較高，因此在職業的競爭上常常佔上風，自然導致其他民族的不滿。這種情形在二〇年代到三〇年代間五年經濟計劃和工業化時期已很明顯。這並不是共產主義所說的階級鬭爭，而是個人間的競爭所導致的對整個團體和種族的偏見。

(2) 政治衝突：此種衝突，早在革命之前，布黨與孟黨之爭時就已開始。革命成功後，猶太人又充斥在許多政府機構內，扮演著不受歡迎的共產主義推行者的角色。根據羅也·麥德維捷夫 (Roy Medvedev) 在一九七〇年五月地下刊物的一篇論文中提到，一九二〇年初，超過四分之一的黨中央委員爲猶太人<sup>③</sup>。此外，在契卡·格別烏機構內的秘密警察中，猶太人也佔了很大的比例，因而導致一般人民將反共產主義與反猶太主義視爲一體。後來到了史達林與托洛茨基政治衝突事件發生後，反猶太運動達到了高潮。史達林發動反托洛茨基及其同黨的運動也帶動了政治性反猶太運動。因而在大整肅時代，猶太人所受的迫害自然要超出其他民族。大整肅的目的之一是史達林力圖除去那些對列寧忠誠的舊布黨份子和托洛茨基的同黨份子，而他們大部分是猶太人。事實上，布爾什維克主義本來就含有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成份，史達林藉此發動大整肅，意圖消除猶太人在黨內和政府機構內的影響力。

## (二) 反錫主義 (Anti-Zionism)

錫安主義（或稱猶太復國主義）可以說是蘇共政權與其境內猶太人最重要最根本的衝突。在帝俄時代，猶太教與猶太主義是

<sup>②</sup> Bernard D. Weinryl, <Antisemitism in Soviet Russia, > in Lonel Kochan (ed.), *The Jews in Soviet Russia Since 1917*, p. 294.

沙皇政權最不能忍受的猶太思想；到了蘇聯時代，這兩者都沒有被剷除，反而變為更加複雜的錫安主義。這也是蘇聯當局一直到現在仍不斷反對的民族社會的問題之一。

錫安主義的名字源於耶路撒冷的一個小丘，出現於十九世紀末，到了二十世紀初，更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猶太民衆間廣為流傳。錫安主義者爲了維持資本主義式的社會模式，並躲避共產主義的革命，提出了一個具體的方案，就是藉著列強的幫助來建立一個猶太王國。這個計劃源自奧地利錫安主義理論家錫歐德·赫思（Theodor Herzl）的著作《猶太帝國》（一八九六年）。一八九七年首屆錫安大會在瑞士巴塞爾舉行，會中成立了世界錫安組織，宗旨定爲「建立猶太民族在巴勒斯坦的政治權利避難所」。錫安主義大部份源自以猶太教爲主的猶太主義教條。根據蘇聯方面的看法，錫安主義尚含有民族資本主義與大國沙文主義的思想，強調「世界猶太人與錫安主義的親密關係，猶太個人的利益必須隸屬於錫安主義」<sup>②</sup>。

馬克思社會主義在意識形態上是絕對與錫安主義相衝突的。在革命成功初期，出現在黨政團體的猶太人，很多是錫安主義者，無怪乎蘇聯當局在極力剷除錫安主義時，竟將大部份猶太人民硬視爲錫安主義份子，以貫徹其反錫安主義的政策。

一九四八年，根據聯合國的決議，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了以色列國家，錫安主義成爲以色列正式的國家意識形態。錫安主義的主旨是，呼籲世界各地猶太人無條件支持以色列，把世界各地猶太人的力量集中到以色列去。一九七二年在耶路撒冷召開的第二十八屆世界錫安組織大會決議：「所有錫安主義或支持錫安主義的組織，必須在任何環境條件下幫助猶太王國」<sup>③</sup>。共產黨人覺得，錫安主義具有資本主義和擴張主義的特質，因此當然會極力反對共產主義。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後，錫安主義演變成反蘇運動。所以，不管在政治觀點與意識形態上，或在民族主義政策上，蘇聯當局與錫安主義是無法相容的。

不難想像，蘇聯在反對錫安主義的前提下，自然支持阿拉伯人民的解放運動。蘇聯官方宣稱，以色列的錫安主義當局，在中東進行侵略政策和損害阿拉伯人民利益的擴張政策，尤其是損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利益，這種擴張政策致使以色列在中東地區成爲帝國主義的憲兵<sup>④</sup>。

國際錫安組織分佈極廣，主要領導中心設在美國紐約和耶路撒冷，指揮世界六十多個錫安組織。其中較大的有世界錫安婦女組織、世界錫安工人運動組織、美國錫安組織等。另外猶太議會（成立於一九三六年）遍佈於世界六十七個國家，也受錫安組織的指揮。世界錫安組織有雄厚的財力，其資金來自世界各地猶太人的捐助。錫安組織在世界上各地的大衆傳播界很有影響力，其

註② *Bolshevik Sovetskaya Entsiklopediya*, (莫斯科：蘇聯百科全書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第三版，第二十三冊，頁四四五—四四六。

註③ *Ibid.*

註④ *Ibid.*

中最受影響的地區包括美國、西歐、拉丁美洲、非洲和澳洲等。因此蘇聯不斷指控美國領導階層受到猶太錫安組織的影響，而進行反蘇和醜化蘇聯。蘇聯當局更進而宣稱錫安組織破壞美蘇間的正常化關係<sup>②</sup>。因此每當美國或西歐提出蘇聯人權問題時，蘇聯當局總是認爲，這是受到猶太錫安組織的左右，使美國態度強硬與不妥協。

同時，由於錫安主義影響到國際事務，致使猶太人問題在蘇聯變得更爲尖銳，對猶太人迫害的程度也常隨著國際局勢而變化。例如一九三九年八月，蘇聯與納粹德國簽定互不侵犯協定後，反猶太宣傳成爲蘇聯政策之一。在這段期間內，從鄰近地區如：波蘭、波羅的海東岸諸國和莫達維亞等地，有二百萬猶太人逃至蘇聯，蘇聯當局或將他們交給納粹，或送往西伯利亞的勞工營。在此期間，蘇聯境內的猶太人死傷高達數百萬。戰後，由於戰爭的創痛，蘇聯在仇外心理下展開報復。在盲目的愛國主義及俄羅斯民族主義盛行下，所有與「國際主義」發生關係的民族，尤其猶太民族，成了衆矢之的。在此氣氛下，許多猶太人都從政府公職上撤換下來，在高等學府內建立配額制度，限制猶太學生入學的人數。其後，東西方冷戰時期，可說是蘇聯境內猶太人的黑暗時期，所有猶太文化機構，包括猶太報紙、出版機構、學校、劇院等都被關閉。根據史達林女兒史薇拉娜(Svetlana Alliluyeva)的說法，史達林在其統治晚年，傾向於盲目的愛國主義和反猶太主義。他將第二次大戰期間組成的猶太反法西斯委員會視爲美國錫安主義的代理人，並認爲戰後這個組織建議在克里米亞建立的猶太省是美帝國主義的陰謀，目的是要奪取蘇聯的克里米亞地區。於是這個組織在一九四八年九月被解散<sup>③</sup>。

到了赫魯雪夫時代，迫害猶太人的運動稍見緩和，但根本問題仍未解決。一九六〇年代初期，赫魯雪夫展開了一連串的反經濟犯罪運動，許多猶太人又被牽涉在內。凡是有關猶太人的部份，又被傳播媒體大肆渲染，因而對猶太經濟罪犯的懲罰也比較嚴苛。在二百五十名被處決的經濟犯中，有一半是猶太人。近年來，一方面由於蘇聯內部猶太不滿份子的運動和大量猶太人申請移民國外，另一方面由於蘇聯在中東支持阿拉伯與反錫安份子的宣傳，更由於國外輿論對蘇聯境內猶太人的支持，使得蘇聯境內的猶太人在蘇聯社會的地位更加困窘。在較高的學術機構和就業方面都產生了排斥猶太人的強烈傾向。此外，軍事機構、有關國家機密的機構、政府機構和大學、研究所等有明顯排斥猶太人的現象，猶太人再度淪爲蘇聯內部的二等公民，自然造成了猶太人不

## 五、蘇聯政策下的猶太不滿運動

七〇年代，猶太人問題隨著中東情勢的尖銳化而變得更爲嚴重。一九六七年六月的以阿戰爭，蘇聯在外交政策上支持阿拉伯

註② *Ibid.*

註③ Zev Katz, "After the Six-Day War," in Lionel Kochan (ed.), *The Jews in Soviet Russia Since 1917*, p. 325.

斷移民國外的趨勢。

對抗以色列，激發了蘇聯境內的猶太人對猶太文化的回歸，加上國外輿論的催化，使得蘇聯政府、蘇聯猶太人和以色列之間的關係變得非常複雜。結果，許多蘇聯猶太人成爲蘇聯政權下的不滿份子，更有許多猶太人試圖斷絕與蘇聯的所有關係而移民以色列。在蘇聯移民問題和不滿份子運動的相互關係在以阿戰爭之前並不是十分緊密。俄國猶太人移民國外的現象由來已久，早在帝俄時代就發生過幾次移民潮，但是到了以阿戰爭以後，這兩種勢力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成了蘇聯當局最頭痛的問題之一。

在以色列建國初期，蘇聯惟恐英國控制巴勒斯坦地區，同時也想使其勢力進入中東，因此在以色列建國後，立即予以承認。一九六七年以阿戰爭發生後，蘇聯政策改變，大力支持阿拉伯國家，使蘇聯猶太人極端不滿。據當時留在莫斯科的外國學生描述，有些猶太學生偷偷地慶祝以色列的勝利；當局知道了他們的慶祝。立刻大肆逮捕。蘇聯當局曾脅迫猶太人簽署一封公開譴責以色列的信，但許多人都拒絕了<sup>②</sup>。據報導，被逮捕的市民和學生都被判錫安主義份子的罪名。接著，蘇聯政府發動傳播界指責以色列、錫安主義份子和世界猶太人。蘇聯宣傳說：「以色列是世界帝國主義的一部份，其目的在建立帝國主義與統治世界。」<sup>①</sup>無疑地，猶太組織、世界猶太團體和許多國家的猶太社區實際上是最反動的資產階級。<sup>②</sup>另外還有許多蘇聯作家從事反猶太的著述。例如尤里·伊凡諾夫（Yury Ivanov）在他一九六九年<sup>△</sup>注意！錫安主義<sup>▽</sup>的論著中提到：「錫安主義的意識形態及其組織和猶太資產階級的政治陰謀已混入了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壟斷集團，其基本內容是好戰的盲目愛國主義與反共主義……國際錫安主義聯盟組織相互結成一個網，在資本主義國家最反動的勢力中扮演了秘密政治管道的角色，如在美國、西德、英國和以色列的「贖武主義」<sup>③</sup>。無疑地，這些宣傳再度激起了蘇聯內部嚴重的排猶運動。相應地，以阿戰爭後，蘇聯境內的猶太人也開始了他們的不滿運動。一九六七年在捷克發生的自由化與民主化運動，更使得雙方衝突的表面化。因爲捷克境內有許多自由主義的共產黨人爲猶太人，而親蘇保守主義份子只佔少數。蘇聯領導階層想藉著反猶太運動來切斷捷克自由派各領導者的統一聯合，以削弱猶太人的力量。蘇共也利用一般民衆的民族主義情緒和種族偏見去對抗被猶太人控制的捷克政府。最後蘇聯在一九六八年八月利用軍事干預，迫使捷克的自由派領導階層倒臺，使保守主義聯盟獲得勝利。另外，一九六八年波蘭的學生運動也和猶太問題發生關連。波蘭內部有許多學生領袖爲猶太人，而波蘭當權者藉著反猶太運動迫害在文化界或科學界表現傑出的猶太人。蘇聯雖不是這個政策的煽動者，但絕對支持排猶運動。蘇聯的報章雜誌刊登了一些波蘭政府反猶太主義運動的文章，並深信波蘭的三月事件爲國際錫安主義的一項陰謀<sup>④</sup>。

註<sup>①</sup> *Ibid.*, pp. 321-322.

註<sup>②</sup> *Ibid.*, pp. 323-324.

註<sup>③</sup> *Ibid.*, p. 325.

這兩宗事件以後，蘇聯境內的猶太不滿份子運動漸漸和要求自由民主的蘇聯不滿份子運動結合在一起，從後者的刊物中可常常看到反對蘇聯政府對猶太人政策的文章。因此，蘇聯當局不得不更加提高警覺。其中有兩個明顯的現象令蘇聯政府頭痛不已。第一，猶太人利用一切可能的傳播媒體與外界接觸，突破了鐵幕的封鎖。因此儘管蘇聯當局可使用鎮壓的手段來對付內部大規模的反抗，但却無法阻止外界對它漠視人權的譴責。第二，猶太人不滿運動的持續，提供了其他受不平等待遇的階層一個活生生的榜樣。告訴他們與其等待當權派的改革，不如由受統治者不斷地要求、反抗，以迫使當局改變政策。由於這些現象，蘇聯政府不得不設法將猶太不滿份子運動與社會其他階層隔絕開來，並謹慎處理此項問題，儘量避免外界的干擾。但是在執行方面，當局又遭到許多困難，致使矛盾層出不窮。因為此時已不像史達林時代一樣，不能使用嚴厲的鎮壓手段。這不僅由於它的一舉一動都在全世界衆目睽睽的監視之下，也由於它要面對本身政治發展上的許多問題：它既須放棄史達林時代的恐怖統治方式，而把社會納入正常的發展軌道；又要預防社會其他階層提出改變權力結構的要求。這類階層包含自由派知識份子、經濟改革派和其他民族團體。阿瑪利克（Andrei Amalrik）在一九六九年《蘇聯能生存到一九八四年嗎？》的論著中敘述蘇聯政權的遲鈍說：「它只希望所有的事都和過去一樣；權威被承認，知識分子保持沉默，不以危險的和無經驗的改革動搖體制……它的箴言是：你們不要惹我們，我們也不惹你們；其目標是：一切保持原狀」<sup>⑤</sup>。

自史達林死後，由於社會的變遷和情勢的需求，蘇聯政府在手段上已較緩和，但這一情勢也暴露了它的弱點。它在處理猶太人問題上，原欲將所有內部的反抗都視為一體，但其困難是：既不能將所有猶太人送到西伯利亞，又不能准許猶太人自由移民或享有所有公民權利。另一方面，猶太人要求自由和解放這事件，激起了蘇聯內部的普遍反應，人們反對蘇聯的極權統治，爭取自由，進而要求整個社會的解放。這種情形對蘇聯當局是一個嚴重的威脅。更重要的是，整個情勢的傾向是要迫使政府設法來容忍這個威脅。由此可知，猶太人運動已到了不能不加控制的地步；但是控制的方法又必須在全面放寬或全面鎮壓兩個極端之間作一折衷性的選擇。這當中唯一能嚴格執行的就是停止批准向以色列移民。

## 六、移民問題

以阿戰爭後，有一些猶太人公開放棄蘇聯公民權，要求當局准予移民至以色列。這使猶太人問題變得更為複雜。事實上，蘇聯猶太人向國外移民已不是一個新的現象，但是一九七〇年代的移民風潮，却有不同的時代背景。當然以阿戰爭只能算是因素之

註⑤ Andrei Amalrik, *Will the Soviet Union Survive Until 1984?*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p. 22-23.

一，另外還有其它的複雜因素：

(一)蘇聯猶太人的生活具有高度移動性。作爲一個種族團體，他們在蘇聯已經歷了兩次主要的變遷。第一次是內戰時期，由「殖民定居區」向都市集中；第二次是二次大戰期間，由西部邊區遷往內部主要大城市。另外，幾乎所有蘇聯猶太人都有親友在國外，因此他們有足夠的國外支持，包括精神上與財務上的支持，更促成移民國外的傾向。

(二)以色列的出現，對他們而言是一種象徵性的家園。

(三)蘇聯境內猶太人以家庭或社區爲單位，相互關係緊密，彼此支助。因此一家人移民成功，很容易引發另一家移民的動機。四蘇聯當局一向限制猶太人的個人權利，對進入大學以上的高級學府和在就業上限制尤嚴。這自然也迫使猶太人移民他國。

(四)文化宗教因素。一些未曾同化的猶太宗教份子，一旦受到宗教因素的迫害，往往強烈要求移民。

(五)尋求較高的教育機會與較好的就業機會。近年來，蘇聯猶太人移民的最後目的地大多是西方國家或美國，以色列只是一個轉航站。他們主要的目的是爲下一代開創較好的就學與就業機會。

另外，蘇聯內部領導階層的權力鬭爭也促成了七〇年代大批蘇聯猶太人的外移。一九七一年初大批猶太人獲准移民國外，是由於蘇聯政權內部「自由派」領導階層戰勝了「新史達林派」領導階層。這兩派對於解決猶太不滿份子運動與移民問題的主張截然不同。早期的猶太人政策由「新史達林派」來決定，但是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五至二十四日的「列寧格勒大審判事件」<sup>②</sup>，引起了世界各國的抗議，其中包括法國、義大利與英國等共產黨，呼籲蘇聯當局正視大眾的意見。而「新史達林派」既提不出令人滿意的辦法，又受到錫安主義份子的威脅，終於失去權勢。當時蘇聯當局根本未預期到世界輿論會因此事而對蘇聯內政進行如此強烈的攻擊。「自由派」藉機崛起，掌握實權，提出了較具彈性的猶太人政策，其中包括放寬猶太人的移民配額。另外，美蘇關係情勢的緩和，無形中也使猶太人的移民配額得以增加。猶太人移民政策的放寬，有助於美蘇和解，使「自由派」在權力鬭爭上贏得優勢。「自由派」人士中包括當時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 (Kosygin)，國安會 (KGB) 首腦安德洛波夫 (Andropov) 和國家科學院副院長羅曼切夫 (Rumyantsev) 等<sup>③</sup>。

蘇聯的猶太人移民問題常和內政及外交問題複雜地交織在一起。就內政言，蘇聯當局常利用猶太人移民管道去除其內部一些不受歡迎的份子，如不滿運動的激烈份子、「社會敗類」或「政治頑固份子」等。不過，移民政策的放寬，也常帶來許多不良的

註②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五到二十四日在列寧格勒舉行大審，審判兩名企圖截機移民以色列之猶太人。依據蘇聯刑法六十條，駕機逃往國外爲叛國行爲。第十五條，企圖犯罪同犯罪。因此這兩名猶太人被判處死刑，引起世界輿論之攻擊，因而蘇聯當局改判勞工管服役。

註③

Thoma, E. Sawyer, *The Jewish Emigration Issue*, pp. 185-186.



後果。最明顯的現象就是，猶太人移民的放寬常激發內部其他民族要求的權利及許多民族團體要求在其地區內擁有進一步的自治權。另外，移民政策的放寬，也激發人民要求蘇聯政府對人權的尊重，要求更多的言論、出版、旅遊等自由，甚至要求在政治上容許有限的反對意見。

就外交言，猶太人移民政策的放寬是蘇聯擴大外交關係的重要因素之一。蘇聯和東歐諸國想提升科技水準，從而維護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活力，常需仰賴西方的科技和擴大對西方的貿易。因此，在猶太人移民問題上，有時不得不妥協。在六〇年代末期，蘇聯因中東問題而嚴格控制猶太人移民國外，並利用徵收移民費以阻止猶太人的外移。到了七〇年代初期，美國參議員傑克森——凡涅克提出貿易修正案，「禁止延長對蘇聯和東歐各國的最惠國關稅待遇、美國政府貸款信用保證和投資保證」<sup>②</sup>。接著，美國國會又提出史蒂文生修正案，規定蘇聯向美國銀行信用貸款，其數目不得超過三億美元。在一九七二和七三兩年，蘇聯在猶太人移民問題上做出了讓步，使得移民人數激增，但是隨著傑克森貿易修正案在七四年的通過，蘇聯再度減少猶太人的移民人數。

另外，蘇聯的猶太人移民政策與蘇聯試圖介入中東地區有關。蘇聯必須藉著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衝突，才能產生對該地區的影響力。在這方面，蘇聯運用猶太人移民政策，牽制以色列並插手中東事務。事實上，若干觀察家認為，蘇聯在七〇年代初期猶太人移民政策的放寬是意圖增加以色列的國家預算，藉以增加其經濟負荷而影響其內政。另外也有人認為，蘇聯想藉猶太人的移民以加重以色列國內住屋嚴重短缺的問題。一九六七年以阿戰爭後，表面上蘇聯與以色列斷絕了外交關係，但雙方仍不斷透過美國和聯合國進行各項實質交往。自戈巴契夫任蘇共總書記後，蘇聯積極從事和平宣傳，去年中又傳出了蘇聯想與以色列復交的消息。不管蘇聯當局如何玩弄外交手法，仍將利用猶太人移民問題向西方和以色列榨取政治與經濟利益。

儘管蘇聯常以移民問題作為外交敲榨手段，但基本上仍極力抑制猶太人的移民國外，其主要原因是猶太人在科學、教育、醫學、經濟和藝術上的貢獻是得到肯定的。蘇聯為限制猶太人外流所採取的方法有二：第一是利用宣傳。這種宣傳在兩個層面上同時進行。在意識形態上，強調以色列為一法西斯國家，錫安主義就是國際帝國主義的典型。在現實層面上，加強報導蘇聯猶太人到達以色列後，夢想破滅的悲慘故事。強調當地生活水準低、工作機會缺乏和驢武國家的恐怖等等。第二是運用騷擾手段。這種手段就是運用各種複雜而困難的移民程序以打消申請人的念頭，徵收九百元盧布以上的基本稅金（約為七到八個月的個人薪水）。受過高中以上的教育的猶太人，還要償付高額的教育補償費。此外，嚴厲審判錫安主義份子，以收殺雞儆猴的效果。猶太人一旦提出申請，很容易陷入許多困境：如遭到排斥、撤職、恐嚇，或勸其改變心意等，甚至在提出申請而失業後，有被判「寄生蟲」罪名的可能性。儘管如此，據報導，到去年為止，提出移民申請的猶太人數就高達四十多萬人<sup>③</sup>。可見猶太人脫離共產極權統

治的熱望是很難加以遏止的。

到了七〇年代後期，蘇聯猶太人的移民問題本身也經歷了一些改變。愈來愈多的蘇聯猶太人以維也納或奧地利等其他城市作為轉進站，直接轉往西方國家或美國定居，而不前往以色列。這種趨勢嚴重影響到以色列的國際聲望與內部政策。許多受較高教育的移民，為了追求個人事業的發展，寧願到比較有利的環境如美國等去謀求發展。有一些人因為習慣了俄國寒冷的氣候，對於以色列不穩定的氣候不能適應；有些人反對以色列的政治體制，寧願遷往美國或加拿大等比較資本主義化的國家去；另外有人擔心中東政局混亂、以色列通貨膨脹、房屋短缺與語言障礙等等問題。當然美國在財力與移民手續上，也給予蘇聯猶太人移民者大量的幫助，因此移民到美國的猶太人人數不斷增加。

真正面臨困境的乃是那些不想離開或不能離開蘇聯的猶太人。若干專家認為，移民運動的成功可能會導致蘇聯內部反猶太情緒的高漲，而視猶太人為背叛者。每當蘇聯當局為了欲取得美國貸款或討好國際評論等原因而放鬆猶太人移民時，其他數百萬留下來的人就要受到當局的任意擺佈或報復。事實上，如果一個民族團體的成員公開宣稱放棄蘇聯公民權而寧願歸附於另一個國家時，對於蘇聯當局來說，該團體的成員在任何選舉中絕不是值得信任的第一候選人。不管他如何努力同化於這個社會，他永遠是一個次等公民。這種惡性循環，導致更多猶太人想離開蘇聯。

## 七、結 論

猶太人是一個特殊的民族，它具有悠久的歷史，堅強的宗教信仰。他們的生活信念凝聚在一部猶太教法典上，很難與其他種族或民族相融合。不幸的是，這個民族早在紀元前六世紀就已亡國，而亡國期間幾乎達二十五世紀之久。更重要的是，他們散佈於世界各地，因而造成了許多國家的內部問題。另外，猶太人在商業上善於經營與管理，很容易在他們生存的社會中壟斷經濟力。這種現象造成了當地政權的不安全感，也導致了猶太人與當權者之間的政經鬭爭，而種下了受迫害的根由。

幾世紀以來，猶太人問題在西方國家內早已是一項普遍的問題，甚至在二十世紀高度民主化的美國，也不免存在著猶太人問題。猶太人控制著美國財經界，而且常透過財經的控制而影響政策的走向。不過，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裏，這一個問題尚不至於太過突出而敏感。相反的，在一個極權統治的政權下，同樣的問題，就顯得非常尖銳了。帝俄專制時代，當然無法容忍它的政權受到內部任何一個民族的挑戰。在神權和君權的時代裏，政府的威信常源自於宗教和文化，因此猶太人對宗教和猶太主義的堅持，自然無法見容於以東正教為主的俄國社會和政權。二十世紀的革命破壞了神權和君權的基礎，但是在共產主義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下，權力趨向一元化，而且高度集中，於是猶太人尋求解放的美夢在共產政權下，變成了權力鬭爭的犧牲品。隨著出身猶太

家庭的托洛茨基被整，加上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與猶太人傳統經濟生活方式之間的尖銳衝突，蘇聯猶太人問題較之帝俄時代乃更表面化。最重要的是，自第二次大戰以後，美蘇對抗，互爭雄長，在國際宣傳的運用上，蘇聯的猶太人問題乃被用來作為反蘇宣傳材料。迨至卡特政府強調人權主張，蘇聯的猶太人問題又被扣上了違反人權的帽子，使得蘇聯在猶太人問題的處理上更為困難。二十世紀傳播工具發展快速、瞬息傳播、無遠弗及，加上猶太人散佈於世界各地，遂使蘇聯的猶太人問題由單純的內政問題投進了國際政治舞臺。在內政與外交的交互作用下，蘇聯境內的猶太人不斷興起風起雲湧的移民潮。猶太人問題如不獲完滿解決，蘇聯共產政權恐將永無寧日。

(本文作者係本中心助理研究員)

## 國際問題講演集

25開本 全一冊

本集所收，為國內外學者在本中心(所)所作專題講演與討論之紀錄，內容則全存原貌，對於若干特別問題，尤具參考價值，所收資料自民國六十二年起到七十一年止。全書三十餘萬字，計四四二頁，實售新臺幣二〇〇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二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編印  
郵撥：〇〇〇三四三六一二號帳戶